

老归侨的故事（第258篇下）

五岁，我抱着洋娃娃从南洋回到祖国

一聽媽媽說要把我心愛的娃娃送給別人，我大聲地哭個不停，場面更亂了。後來據說是一位上級軍人作主放行，洋娃娃得以倖免，我們母女四人才勉強趕上火車，繼續北上。

在北京，我們和先期回國的爸爸會合了，有了安定的新家。那時北京的基本色彩是土地的黃色和瓦房的灰色，車輛稀少，胡同裡每天下午定時有人搖鈴招呼，各家各戶端著臉盆出來“潑街”壓塵。寒冷的冬季，從熱帶來的我們此起彼伏地咳嗽，媽媽的對策就是把從印尼帶來的“虎標油”抹在我們的前額和脖子上。

到北京不久，我考上了北京的名校師大二附小（即後來的第二實驗小學）。學校離我家很近，考試也很簡單，儘管排隊報名時有人指著我說：這個孩子太小了，恐怕考不上，我還是很順利地考上了。

開學前班主任鄭老師來我家訪問，我象過去在南洋家裡一樣，毫無顧忌地光著腳，坐在涼爽的花磚地上仰視她；幾天後我又與眾不同地光腳穿著皮鞋，走進了這所國內最好的小學，與劉少奇、郭沫若等人的子女作了校友。我在這裡度過了幸福的六年時光，接受了那個時代中國最好的基礎教育，獲益終生。



回国后作者与母亲摄于北京

師大二附小擁有一批優秀的師資，有些女教師終身未嫁，以校為家。記得二年級時，有一天放學趕上大雨，我渾身淋得濕透，半路又跑回學校。我當時的班主任陳老師是個年過半百、戴著大圓眼鏡的胖老太太，正巧在校門口看見我落湯雞似的模樣，忙把我拉進她獨自住的小屋，從箱子裡拿出一件壓得平平整整的白色上衣給我換上。那件寬大的衣服穿在我瘦小的身體上是什麼樣子可想而知，但當時那種溫暖的感覺，衣服散發出的那股好聞的“太陽味兒”，直到今天我也沒有忘記。

每逢星期天，媽媽喜歡帶我到位於東城王大人胡同的王紀元伯伯家玩，王紀元伯伯是與爸爸共事多年的老朋友，他的太太施碧青阿姨和媽媽也是好朋友，我們剛到北京沒有安頓好的時候就住在他們家。施阿姨非常熱情

好客，星期天王家永遠賓客滿座，熱鬧無比，到這裡來的大都是回國讀書的歸僑學生，聚在一起說呀笑呀，我就在他們中間跑來跑去。學生中有一個男生名叫“曙明”，和我的名字“素明”發音差不多，往往有人一喊“曙明！”我就跟著一起答應。

施阿姨在廚房不停地做飯，炒菜，忙得滿頭大汗，再端出來給大家吃。她的廚藝極好，而且從不厭煩，學生們像在自己家裡一樣，吃得毫無拘束。而在這座眾聲喧嘩的房子的某一個角落，我總是看到王紀元伯伯和顏悅色地坐在一張搖椅上，靜靜地看他的書。

那時爸爸在印尼教過的學生也常到我家來，蓄著小鬍子的劉漢光剛回國時就在我家住過半年。劉漢光愛畫畫，考過中央美術學院但未能如願，後來就進了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工作。

記得在好久不見之後的一天下午，他穿得整整齊齊，提著一台當時很難見到的大錄音機來到我家，讓我讀一篇爸爸以我的口吻寫好的稿子，給我錄音。稿子的內容是向海外的華僑介紹我在北京的幸福生活，我高高興興地照辦了，不僅充分表達了我的幸福，還不無驕傲地展示了我無可挑剔的普通話。

我在北京一年年長大了，從人們眼裡與眾不同的“小華僑”，變成了和周圍同學相差無幾的師大二附小學生。我喜歡這種變化，希望自己和大家一樣，不願意別人叫我“小華僑”，因為一說“華僑”，就會引來人們好奇的目光。我不願意被人另眼相看，儘管在上世紀五十年代，中國社會對華僑的另眼相看並無惡意，政策對歸僑還有不少照顧。記得劉漢光說，他不滿單位領導給他的待遇、講話不投機時，曾一拍桌子，吼道：“我是華僑！”這一吼是否奏效不得而知，但想來在當時的形勢下是不會帶來多大麻煩的，否則他也不敢這樣吼。

在以後的日子裡，情況發生了變化，歸僑的正面地位向反面轉化，災難連連，令澎湃的歸國潮流嘎然而止，掉轉方向，變為洶湧的出國潮。我家沒有走，完整地經歷了歸僑在國內的幾番沉浮。成年

後，我的歸僑身份給我帶來過不少麻煩，待麻煩過去，卻又有人發問：“她算華僑嗎？”……

現在的我，對這一切都已經淡然視之了。自己願意也好，不願意也好，別人說算也好，不算也好，我都是一個華僑，歸國華僑，毫無疑義。

那個曾經與我形影不離的洋娃娃後來成了我的妹妹的玩具，最後淹沒在翻天覆地的歲月裡，不知所終。

想當年，僑委（華僑事務委員會）的所在地——北京王大人胡同對廣大歸僑來說是一個富於情感的溫暖之地，那裡的工作人員本身多是歸僑，認認真真做著團結華僑的工作，實實在在為歸僑排憂解難，幼年時期的我就曾親身感受過身為僑委領導幹部的王紀元夫婦不計得失的奉獻。想想看，當被愛國熱情催動回國讀書的華僑子弟們去家萬里、遠離雙親、特別需要身心關懷的時候，正是因為有這些真誠的長輩善待他們，他們才在新中國獲得了家的感覺，進而決心傾力報效祖國！

每當我回想起兒時的親眼所見，就不禁對逝去的老人們肅然起敬。逝者已去，感懷久長，但願那逝去年代的美好情感沒有走遠，還會再來！

作者：梭罗河
来源：南洋侨网